

也谈“中国模式”

■资中筠

近年来“中国模式”成为热门话题,而且是国际话题。不过我还想从另一个角度再加论述。实际上,当前“中国模式”之说似乎是个伪命题。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有其自己的特色,几乎没有两个国家是相同的,英国与美国就不同,德国与日本也不同。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有其共同的规律。现代经济发展若一定要分出模式,则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模式”。前者已为实践证明失败,中国正处于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型中,这个过程尚未结束,自有其历史传统和转型中的阶段性特色。

对改革开放前 30 年和后 30 年,究竟后 30 年的成就是前 30 年的继续还是反其道而行的

飞鸟之死

■赵凝

汽车在古丝绸之路上行驶,路长得令人忘记了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沿路左右徘徊着的,是一段绵长的土城墙(不知哪朝哪代的),土城墙经过千年风雪的侵袭,已经辨不出原来的样子了,没有了棱角,没有了墙的俏丽和锋芒,甚至,它们都不像一段真正的墙,远远看去,很像连在一起的自然形成的土丘。

给我们开车的甘师傅说,这就是古长城。公路一直和古长城平行向前,路长得没有尽头,前后看不到一辆车,我们像漫游在古道上的唯一的游客,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这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背着行囊在公路边行走的人,由于车速太快,独行者的身影像一粒黑灰色飞鸟的影子,在车窗边一闪而过。我回过头去看他,只看见他和他手里紧紧攥着的一把伞,他身上的一切都是黑灰色的,包括手中的伞。他没有表情,也不朝两边看,好像什么都与他无关,他只是一步步地朝前走,走着本身就是目的。他那副执拗的神情,让我想起几天来常在沙漠里看到的那种草。

那种草没有名字,它们只是神情执拗地牢牢抓住土——能抓住多少算多少,因此,被它们抓住的地方就鼓起了一个如大地乳房般的小山包,放眼望去,有草的地方就有这种小山包,平坦的地方赤裸着、干渴着、荒芜着,千年

文明与野蛮

■易中天

事实上,正如治国之道常常被看做是烹调术,它也被常被看做是纺织业。中国古代的所谓“圣王”,都被描述成“经天纬地”的大人物。经,是织布机或纺织品的纵线,纬则是横线。经天纬地,就是像纺织织布一样有条有理地治理天下。

其实,所谓“治理”,原本也是纺织业上的术语,即把一团乱麻或乱丝,“理”出一个头绪来。治理天下国家,既然有如“理乱丝”,或如“烹小鲜”,则“王天下”者,也必是裁缝或厨师。比如伏羲(庖牺)是大厨师,黄帝(轩辕)则是大裁缝。据说,是我们民族最早的服饰发明家,也是最早拟订服饰体制的大礼学家。黄帝的主要发明,是旃、冕和旒。旃是一种军旗,冕是一种礼帽,旒则是旗下的飘带和冕前的下垂物。看来,黄帝的主要贡献,在于“饰”。而养蚕业和制衣业的发明人和领导人,则分别是他的正妻嫫祖和他的臣属胡曹。当然,他们的功劳也都可以照例归于黄帝。据说,自从黄帝制定了服饰礼仪后,紊乱无序的天下便变得井然有序了。以后,尧、舜二位,也照此办理。传到禹时,虽然自己穿的穿着不讲究,但祭礼之服还是不含糊的。这就叫做“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伏羲是三皇之首,黄帝是五帝之先,尧和舜都是神化了的部落联盟长,他们几位带了头,以后的“圣王”,或比圣王低一等的“明君”,或比明君还低一等的候补明君,以及预备辅佐他们平治天下的儒臣门,便都相当地重视服饰的事情,而且往往能“上纲上线”到国家兴亡、民族存亡的高度。比如衣襟向右开(右衽)还是向左开(左衽),就不是可以马虎的小事。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学生讨论对管仲的评价问题。他的两个学生子路和子贡都认为管仲“不仁”。因为管仲原是公子纠的师傅。齐桓公(即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争夺君位,杀了公子纠,公子纠的另一位师傅召忽因此殉节而死,而管仲非但不自杀,反倒投靠桓公,成了桓公的得力辅佐,这不是叛徒吗?怎么能算是“仁”呢?孔子却说,啊!要是没有管仲,我们这些人,只怕都早已披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了!可见,在孔子这里,衣襟向哪边开,至少比谁当国君要重要一些,也比什么“从一而终”要重要一些。

这就很有些非得要弄清姓资姓社,分个白猫黑猫的味道了。其实,不管白猫黑猫,能逮老鼠就是好猫。同样,也甭管右衽左衽,穿着舒服漂亮就是好衣服,哪怕当中开缝也行。然而孔子他们不这么看。

在孔子他们看来,衣襟要是开反了,就会从文明变成野蛮。儒家是很看重这个区别的。用他们的话说,就叫“夷夏之别”。文明人和野蛮人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是吃饭不同,——野蛮人吃生

结果?后 30 年来举世瞩目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如何取得的?

“奇迹”论者喜欢说中国以 30 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道路,这是无视近代史的事实。我们开始走向现代化应该从鸦片战争算起,至少已经走了 170 年,不能无视超过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通过辛勤耕耘已经奠定的现代化基础和积累的成绩——不仅是物质领域而且包括制度、文化、思想领域的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30 年前的再起步决不是紧接中国的古代社会(中国近代史从 1840 年开始,在此以前可算古代),而是至少继承了整个 20 世纪已经取得的积极成果。回首当年,如果我们从 60 年前就遵循这条道路,现在理应达到更高的发展水平,而且不必付出如此巨大的“赶超”代价。

不变,依然故我。

云层浮动,两边是山,车像在云雾里开,这时,一列火车映入我们的眼帘,在开阔的沙漠地带,火车竟然变成了一种极为渺小、小虫子一般的东西。它在天边缓缓地开、慢慢地走,它被浩大的天空和无边的黄沙压缩到画面的一角,那么纤细,那么缓慢,那么小。

有一只飞鸟在瞬间撞上汽车窗玻璃,留下模糊的印迹,鸟被撞得血肉模糊,当场死亡。是车速太快,还是鸟飞行的速度太快?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在城市里我们见过猫被撞死,小狗被撞死,甚至人被撞死,却从未见过展翅高飞的鸟儿被汽车撞上。后来我们发现,汽车每往前开一段,就能看见一只不幸被车撞着的鸟儿的尸体。

也许,大地的原始和裸露,使这里的鸟儿还不具备提防人的本领。它们天真地以为,大地是如此地辽阔,它们什么也撞不上,就在某一瞬间,它们的鸟头就撞上了人类汽车前面的挡风玻璃,血肉迸溅,羽毛纷飞。

差不多每隔 50 米,就能看见公路上躺着一只这样死去的鸟。我们的汽车玻璃上一直留有一只鸟儿扑展着翅膀迎面撞过来的痕迹,那痕迹既模糊又清晰,记录着一个飞行动物的死亡经过。

（《我的美丽与哀愁》,赵凝著,云南人民出版社）

肉,文明人吃熟食。再就是穿衣不同。《礼记·王制》说:东方的野蛮人叫“夷”(东夷),披头散发,身上刻花纹(披发文身);南方的野蛮人叫“蛮”(南蛮),也是光着身子,脸上脚上刻花纹(雕题交趾);西方的野蛮人叫“戎”(西戎),披头散发,拿野兽皮裹在身上(被发皮衣);北方的野蛮人叫“狄”(北狄),拿羽毛毛做衣服,住在洞里(衣羽毛穴居)。这些都是“不开化”民族,通通只能算作野蛮人,没法和华夏民族相提并论。

原来服饰是文化的象征和标志,是有文化与没文化、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分水岭,那当然不得开玩笑。因此,一个中国人,如果穿上了“夷狄”的服装,就会为他人所不齿。比如《阿 Q 正传》中的那位钱太爷的大儿子,从东洋留学回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一身的西装革履,手上还拎了根“司的克”,自以为摩登得不得了,可是父老乡亲都不“吃”那一套,背地里叫他“假洋鬼子”。“鬼子”已不是人,何况还是假的?自然不但“人格”卑下,只怕连“鬼格”也没有。连带他的老婆,虽然因此而跳了三回井,也为虽穷且乏又罕有头发却毕竟留着一小辫子的阿 Q 所不齿,认定她竟然“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所以,当阿 Q 躲在土谷祠里大做其“革命梦”兼“女人梦”时,便把“假洋鬼子的老婆”从候选人的名单中坚决地剔除出去。

（节选自《闲话中国人》,易中天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梨子和橘子的奇遇

■张鸣

孔融 4 岁让梨,陆绩 6 岁怀橘,是传统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博取这么大的名声,代价却小小的,一个不过少吃了几个梨,一个连这点损失都没有,在人家席上顺了几个橘子,被当场抓住,巧言令色了一回而已。

说起来,孔融这点光辉事迹,按理倒是真的属于孝悌之行,只是“好”的程度低了一点,因为长大后一点以后,我们看到,在党锢之祸里,他真的跟兄长争着赴死来的。但是,陆绩这点事就不好说了,“二十四孝”中,就属陆绩上榜最便宜。难怪鲁迅后来讽刺说,这是“二十四孝”中最容易效法的,只要有富人请饭,而且席上有橘子,这孝子就当上了。

“二十四孝”的故事和《三字经》,都是传统中国的蒙童读物,本意就是教育儿童守孝道的。而

建设与破坏交替循环的历史是中国的不幸。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中进两步、退一步,有时大规模破坏、大踏步倒退。远的不说,8 年抗战打断了卓有成效的现代化建设,紧接着 3 年内战,建设无从谈起。到国民政府溃败之时已是民不聊生,百业凋敝,退到谷底。新中国成立后得以在安定的环境中休养生息,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全国人民焕发出极大的积极性,走出谷底,到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经济恢复成效显著,有欣欣向荣之势。当时也有“奇迹”之称。紧接着又几经折腾,走了许多弯路,生产力遭到破坏,直至把全民拖入“文革”浩劫,经济再次跌到谷底。从“文革”后的最低基数出发,出现高增长率的数字,自不奇怪。以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再维持这样的百分比。



茶园

图片来源:www.ynnk.com.cn

喝茶

■梁实秋

我不善品茶,不通茶经,更不懂什么茶道,从无两广之下习习生风的经验。但是,数十年来,喝过不少茶,北平的双喜、天津的大叶、西湖的龙井、六安瓜片、四川的沱茶、云南的普洱、洞庭湖的君山茶、武夷山的岩茶,甚至不登大雅之堂的茶叶梗与满天星随洁净的高末儿,都尝试过。

孩提时,屋里有一把大茶壶,坐在一个有棉衬垫的藤箱里,相当保温,要喝茶自己斟。我们用的是绿豆碗,这种碗大号的是饭碗,小号的是茶碗,作绿豆色。粗糙耐用,当然和宋瓷不能比,和江西瓷不能比,和洋瓷也不能比,可是有一股朴实厚重的风貌,现在这种碗早已绝迹,我很怀念。这种碗打破了不值几文钱,脑勺子上也不至于挨巴掌。银托白瓷小盖碗是祖父母专用的,我们看着并不羡慕。看那小小的一盏,两口就喝完,泡两三回就得换茶叶,多麻烦。如今盖碗很少见了,除非是到故宫博物院拜会蒋院长,他那大客厅里总是会端出盖碗茶敬客。再不就是看电视剧中常看见有盖碗茶,可是演员一手执盖一手执碗缩着脖子啜茶那副狼狽相,令人发噁,因为他不知道喝盖碗茶应该是怎样的喝法。他平素自己喝茶大概一直是用玻璃杯、保温杯之类。如今,我们此地见到的盖碗,多半是近年来本地制造的“万寿无疆”的那种样式,瓷厚了一些;日本制的盖碗,样式微有不同,总觉得有些怪怪的。近有人回大陆,顺便探视我的旧居,带来我三十多年前天天使用的一只瓷盖碗,原是 12 套,只剩此一套了,碗沿还有一点磕碰,睹此旧物,勾起往日的心情,不禁黯然。盖碗究竟是最好的茶具。

茶叶品种繁多,各有擅场。有友来自徽州,同学清华,徽州产茶胜地,但是他看到我用一撮茶叶放在壶里泡茶,表示惊讶,因为他只知道茶叶是烘干打包捆载上船沿江运到沪杭求售,剩下来的茶梗才是家人饮用之物。恰如北人所谓“卖肉的睡凉炕”。我平素喝茶,不是香片就是龙井,多次到大栅栏东鸿记或西鸿记去买茶叶,在柜台前面一站,徒弟搬来凳子让坐,看伙计称茶叶,分成若干小包,包得见棱见角,那份手艺只有药铺伙计可媲美,茉莉花窰过的

何况,这一次的改革开放是分不开的。自 30 年前国门大开以来,欣逢世界步入全球化,许多壁垒已被打破,先进的发明创造可以现成地为我所用,而省去了发明者艰苦探索的过程;繁荣的国际市场和高消费能力支撑了我们迄今为止出口导向的经济。这些因素,加上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契机的思想大解放导致生产力大解放,才是近 30 年迅猛发展的动因。中国十多亿人,只要将原来被压抑的积极性释放出一部分,就可以产生可观的爆发力,取得显著的成绩,如果称之为“奇迹”或“起飞”,也不是中国特有的,许多后发国家在某个发展阶段都有过这一现象,这是遵循常规的结果。

（节选自《感时忧世》,资中筠著,广西师大出版社）

内在生活

■周国平

- 人生的道路分内外两个方面。外在方面是一个人的外部经历,它是有形的,可以简化为一张履历表,标示出了曾经的职业、地位、荣誉等。内在方面是一个人的心路历程,它是无形的,生命的感悟、情感的体验、理想的追求,这些都是履历表反映不了的。
 - 我的看法是,尽管如此,内在方面比外在方面重要得多,它是一个人的**生道路的本质部分。我还认为,外在方面往往由命运、时代、环境、机遇决定,自己没有多少选择的主动权,在尽力而为之后,不妨顺其自然,而应该把主要精力投注于自己可以支配的内在方面。
 - 人应该在自己身上拥有快乐的源泉,它本来就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就看你是否去开掘和充实它。这就是你的心灵。
 - 心灵的快乐是自足的。如果你的心灵足够丰富,即使身处最单调的环境,你仍能自得其乐。如果你的心灵足够高贵,即使遭遇最悲惨的灾难,你仍能自强不息。这是一笔任何外力都夺不走的财富,是孟子所说的“人之安宅”,你可以借之安身立命。
 - 为了抵御世间的诱惑,积极的办法不是压抑低级欲望,而是唤醒、发展和满足高级欲望。我所说的**级欲望指人的精神需要,它也是人性的组成部分。人一旦品尝到和陶醉于更高的快乐,面对形形色色的较低快乐的诱惑就自然有了“定力”。最好的东西你既然已经得到,你对那些次好的东西也就不会特别在乎了。
 - 人在多大程度上不依赖于物质的东西,人就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所谓不依赖,在生存有保障的前提下,是一种精神境界。穷人是不自由的,因为他的生存受制于物质。那些没有精神目标的富人更是不自由的,因为他的全部心灵都受制于物质。自由是精神生活的范畴,物质只是自由的必要条件,永远不是充分条件,永远不可能直接带来自由。
 - 无论个人,还是人类,如果谋求物质不是为了摆脱其束缚而获得精神的自由,人算什么万物之灵呢?
 - 一个专注于精神生活的人,物质上的需求自然是十分简单的。因为他有重要得多的事情要做,没有工夫关心物质方面的区区小事;他沉醉于精神王国的伟大享受,物质享受不再成为诱惑。
 - 在一个人的生活中,精神需求相对于物质需求所占比例越大,他就离神越近。
 - 智者的特点是,一方面,很少的物质就能使他满足,另一方面,再多的物质也不能使他满足。原因只在于,他的心思不在这里,真正能使他满足的是精神事物。
 - 一个人越是珍视心灵生活,他就越容易发现外部世界的有限,因而能够以从容的心态面对。相反,对于没有内在生活的人来说,外部世界就是一切,难免要生怕错过了什么似的急切追赶了。
- （节选自《把心安顿好》,周国平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录成篇,是元朝的事,但这些故事冒出来,却多为东汉末到三国两晋时的杰作。事实上,所谓的“二十四孝”所录的大部分故事的主角,东汉到三国两晋时的人所占比例相当高,丁兰、董永、黄香、王祥、郭巨、孟宗、江革、姜诗、杨香、王裒,还有我们说的这个陆绩,居然有 11 个之多,占 45%强。其实呢,在这种乱世,理所应当是杀人越货、忤逆不孝的坏人多,否则,怎么叫乱世。

当然,不是太平年景大家都不做好事,也没有好人,不讲孝道,仓廪实而后知廉耻,有钱有粮才大行孝道,是人之常情。但是,什么稀缺提倡什么,这是惯例。古人如此,今人也如此,不仅要树大人的典型,更要树娃娃的楷模。于是,一些本来没有大不了的娃娃故事,就变成了英雄事迹。

（节选自《姑妄集》,张鸣著,陕西人民出版社）